



西柏坡

历史二十五讲

◎ 主编/王荣丽 李海明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西柏坡历史|二十五讲

◎主编/王荣丽 李海明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柏坡历史二十五讲/王荣丽,李海明主编;于海龙等编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434-8012-4

I.①西… II.①王… ②李… ③于… III.①中国共产党
—党史—研究—1947~1949 IV.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1173号

西柏坡历史二十五讲

主编/王荣丽 李海明

策 划 于海龙 刘利平

责任编辑 袁淑萍 姬璐璐

装帧设计  BOOKS DESIGN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050061

印 制 河北省财政厅票证文印中心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2.5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8012-4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中部一个普通的小山村。自1947年5月起，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先后移驻于此，西柏坡由此而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解放全中国决定性的胜利；组织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并孕育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赴北平（今北京）建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如今，新中国成立已六十余年，然而，西柏坡的历史及其不朽精神历久弥新，深入人心。

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西柏坡纪念馆与平山县电视台联合举办了“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系列讲座，将西柏坡的历史浓缩成二十五个章节，由西柏坡纪念馆的讲解员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那段辉煌的历史，深情描绘新中国开国伟人、元勋和无数革命前辈的光辉形象，展示波澜壮阔的三大战役决策风云及人民战争的伟力，揭示创



建新中国的民心所向，等等。有的以事见史，有的由事物及精神，让人如临历史之境，把一部活生生的真实的波澜壮阔历史全景式地展示给人民群众。这二十五讲宛如一盏盏明灯，将这段历史最光辉之处映耀千秋。

现在《西柏坡历史二十五讲》即将结集出版，她向我们敞开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让我们一步步走进20世纪40年代末西柏坡那段辉煌的历史，了解她给世人留下的精神真谛。我们坚信，此书作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定能使西柏坡精神弘扬光大，更加激励我们为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编 者

2010年8月

目 录

一	撤离延安	王翠丽	杨丽华/1
二	枣林沟会议		王卫娜/8
三	选址西柏坡		崔 霞/15
四	全国土地会议的筹备过程	李亚辉	郭金娜/21
五	布棚下面创辉煌		袁 晶/28
六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于海龙/35
七	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		刘利平/42
八	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王丽娟	杨丽华/52
九	城南庄会议	彭 丽	刘晓晓/58
十	召开中共中央九月会议		王 芳/65
十一	将帅之争	赵 迪	史丽丽/72
十二	巧施空城计 吓退十万兵	皮月健	祁 磊/79
十三	从小淮海到大淮海		王成丽/88
十四	发起平津战役	刘晓晓	张 静/96



十五	毛泽东和一百九十七封电报	于海龙/111
十六	西柏坡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刘利平/115
十七	成立华北人民政府	王成丽 张云霞/127
十八	接见苏共代表米高扬	康黎黎/136
十九	接见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	于海龙 彭 丽/142
二十	对新中国国体、政体的理论设计	刘利平/149
二十一	确立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陈晓红/156
二十二	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于海龙/163
二十三	规划宣传文化事业	刘利平/172
二十四	奠定外交基石	何茜茜 史丽丽/180
二十五	“两个务必”作风	姚 军 郭金娜/187
	主要参考书目	/194

一 撤离延安

◎ 王翠丽 杨丽华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抢夺胜利果实，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为达此目的，蒋介石集团不惜耍阴谋，搞诡计，在美国的支持下，一面接连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则以“恢复失地”为名，调集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准备全面内战。其企图在于：一是毛泽东如果不去重庆谈判，国民党就可赢得政治和舆论上的主动，宣传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将内战的责任转嫁于共产党；二是如果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国民党即可利用“和谈”麻痹共产党，以拖延时间，获得喘息的时间，部署内战；三是幻想在谈判桌上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以美国的军援为靠山，确立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的“建国”方针。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国内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早已洞若观火。但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在这个过程中揭露美国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力避内战，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基本方针。这就是用争取和平的斗争来否定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策略。

1945年8月，毛泽东乘专机从延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历时四十三天的国共谈判，经过中共代表和解放区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国内



外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保卫了八年抗战的成果，并在军事上赢得了时间。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布了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密令，蒋介石的本性彻底暴露。

中国共产党在努力维护和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奉行毛泽东强调的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介石反我亦反，蒋介石停我亦停”；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盲打，打则必胜”。我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进攻，英勇抗击，奋力拼搏，在1945年的最后三个月里，取得了平汉、平绥、津浦等一连串的胜利，严重挫败了国民党政府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企图，沉重打击了其嚣张气焰。再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某些调整，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强烈呼声，迫使蒋介石于1946年1月10日与我党正式签订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又一次玩弄了两面派花招，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履行协议，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加速完成发动内战的兵力部署，并不停地制造摩擦，挑起战争。

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完成发动内战准备之后，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内战爆发。国民党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而目空一切狂妄宣战，自吹“消灭共产党易如反掌。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的军队”。此时的毛泽东客观而辩证地分析了敌优我劣的力量悬殊情况，在1946年7月明确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藉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军敢打敢拼，英勇顽强，在内战爆发后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

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了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使蒋介石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之后，蒋介石又迅速调整战略部署，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南线的两翼——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企图在消灭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以后，再转用主要兵力于其他战场，以各个消灭人民解放军。1947年3月初，蒋介石派出了大批飞机轰炸我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3月13日，令长期坐镇西北的嫡系胡宗南纠集十四万兵力分两路向延安进攻。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全部兵力约三万人，同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兵力上、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形势十分严峻。延安的形势已经越来越危急了。在胡宗南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紧要时刻，延安是守还是撤？

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必须作出正确回答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面前。3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第一次郑重地讨论延安弃守的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的主张。同时，决定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人民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3月12日，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乘坐飞机撤离延安，国民党空军立即开始对延安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刘少奇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率先自枣园北上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由杨家岭搬到了中央军委所在地王家坪办公，同彭德怀住在一起。这一天，彭德怀从前线检查部队回到延安，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前线部队的情况。听了彭德怀的报告，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心。

但是对于放弃延安，不少干部战士和老百姓还是想不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毛泽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他对新编第4旅的干部们说：“延安要保，却又不可保！我军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



© 1947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

有生力量，今天我们放弃了延安就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延安，解放全中国。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3月13日，胡宗南率部来势汹汹地从洛川、宜川一线开始向延安发起进攻。胡宗南坐镇洛川时，要求“三天占领延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为中共中央机关和广大军民安全撤离延安赢得宝贵时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织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延安保卫战。3月16日，敌人突破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敌人向延安步步紧逼，中共中央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撤离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没有任何的惊慌。已经到了3月18日下午，毛泽东还没有离开延安的意思。他和周恩来一起，在他的窑洞里和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人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彭德怀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多次催促毛泽东迅速撤离，但他坚持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

胡宗南主力部队已过了劳山，正逼近三十里铺，机枪声响成一片，敌人飞机仍在不停地轰炸着。彭德怀再三催促毛泽东早一点撤离延安。毛泽东却说：“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胡宗南的兵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彭德怀着急地说：“那胡蛮的龟儿兵有什么看头！有同志们代你看，你马上给我走！”

太阳快要落山了。炮声、枪声交织在一起，胡宗南的部队已过了二十里铺、十里铺，从南泥湾插到七里铺，接近延安宝塔山了。毛泽东这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说着，他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彭德怀，又说：“你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不用三年就可收复延安。”随后，他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防御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一道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



© 彭德怀在保卫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又叮嘱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你带一个班，再检查一下房子，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家具也一点不要破坏，叫胡宗南知道，我们还要回来的。”毛泽东和王震分手时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在延安保卫战中，西北野战兵团经六天激战，以伤亡六百九十一人的较小代价，取得了毙敌五千二百余人的重大战果，迟滞、消耗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转移的任务。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当耀武扬威的胡宗南来到延安城时，延安早已经是一座空城。他认为我军主力已向安塞“逃窜”，集中五个旅向北追击：一方面向蒋介石邀功，吹嘘：“匪军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蒋介石则强做自我安慰，并发电报嘉奖胡宗南说：“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的积愤，殊堪嘉赏。”特意授给胡宗南“二等大绶云勋章”一枚。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还在西安挂国旗、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

正当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3月25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主力两千九百多人在青化砭被西北野战兵团歼灭，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撤离延安后打的第一个胜仗，随后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三战三捷。党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即向东北方向隐蔽行动，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于3月26日到达清涧县枣林沟，29日召开了枣林沟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



二 枣林沟会议

◎ 王卫娜

枣林沟位于陕北清涧县石嘴驿镇，在当时是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距石嘴驿镇仅有一公里。然而就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在六十多年前见证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也就是在这个普通的陕北小山村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枣林沟会议！讨论决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的行动问题。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集结三十四个旅二十五万人的兵力，由胡宗南指挥，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其首要目标是企图摧毁中国革命的“心脏”——延安。当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六个旅两万多人，仅为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为了诱敌深入，策应其他战场上的我军作战，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国民党军占据延安这座空城后，大肆宣扬所谓的“胜利”，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说：今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然而，蒋介石很快就发现他高兴得太早了。

党中央撤离延安后，于1947年3月26日，来到清涧县枣林沟。毛泽东就住在一排共九孔窑洞且坐北向南的院子里。到达的当天，毛泽东就针对胡

宗南占领延安后所散布的“中共中央已东渡黄河”、“中共也不堪一击”等谣言，由解放军总部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中共中央和边区一级机关全部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安全的！”等等，这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消息，把连日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团团迷雾扫得一干二净，激励着全国人民为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

由于形势严峻，情况危急，3月29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枣林沟会议，正式讨论了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他还不同意给陕北再增加部队，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共中央委托工作。

4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通报了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向河北西柏坡出发后，中央机关留下来的人员按军事编制，也武装起来，组成四个大队，成立了一个司令部，番号三支队，任弼时任支队司令员。同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寓意革命一定能得到胜利。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事业必定能成功。任弼时化名史林，谐音“司令”

毛泽东撤离延安以后，最早决定中共中央“留在陕北不走”，是在1947年3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陕北的任家山会合，召开了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紧急会议，会议初步决定了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不走。当天，毛泽东就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彭德怀。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中说：“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接着，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又说：“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自中共中央作出留在陕北不走的决定以后，各战区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角度考虑，还是多次要求毛泽东撤离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有的甚至提出要增派部队，以保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枣林沟会议，正式讨论中共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并作出了正式决定。这时，阎锡山、傅作义为配合胡宗南在陕北作战，分别向晋西北和晋西地区发动了进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已经转移到晋西北地区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干部、家属，包括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等老同志的安全十分关心。在3月25日的电报中要求已经到达晋绥地区的大部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转移到山西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在晋绥地区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阎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为了解决是把这些人员继续留在晋西北，还是转移到更安全的太行解放区去，以及转移的路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专程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一趟，直接同贺龙和先期抵达晋西北的叶剑英、杨尚昆等商量解决这一问题。3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中直、军直向太行转移的两个方案的指示》中说：为了与贺龙、叶剑英和杨尚昆面商转移的路线，决定“派恩来同志即来晋绥帮助贺、叶、杨处理这一转移工作”。为准备好周恩来东渡黄河的船只，任弼时立即通知王震，从停泊在延水关的船只中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拉到新关渡备用，并叮嘱

10 “对此勿声张”。接受任务后，3月28日，周恩来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